

试论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常庆欣 王 腾

【摘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梳理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共同富裕伟大实践的系统归纳和理论凝结,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论把握,是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在共同富裕领域的深邃理论回答。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在“发展与分配辩证关系”“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阶段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这四个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实践指引。

【关键词】共同富裕;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原创性理论贡献;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常庆欣,男,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腾(通讯作者),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23.2.1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新发展阶段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理论逻辑研究”(项目编号:581122500321)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在理论上取得丰富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共同富裕实践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凝练形成了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梳理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不仅有利于在学理上系统凝练其科学内涵和理论要义,而且有助于理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共同富裕的实践走向及时代价值。因此,本文尝试从“发展与

分配辩证关系”“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阶段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这四重意蕴出发,探究分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一、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上升为系统化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

理论源自实践,科学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在良性互动中实现辩证统一。习近平强调要“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②。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指导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的宝贵思想结晶,是步入新时代后对共同富裕的本质目的、逻辑机理,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实践方法、手段措施等一系列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实践指引。

第一,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伟大实践的系统理论凝结。新时代以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共同富裕。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使我国人民在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实现共享发展,获得更多幸福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③。同年,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郑重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④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华诞之际,习近平庄严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凝结出“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精准扶贫”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新范畴、新思想、新理念,这些都是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共同富裕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把握国际大势、放眼世界,立足新时代我国共同富裕实践,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

第二,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论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取得了彪炳史册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⑥,这体现为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个人收入不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等。这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社会和谐稳定也造成消极影响。此外,我们还应在全球收入差距加速扩大的大背景下思索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近年来国际上收入差距不平等和中产阶级塌陷所造成的民粹主义泛滥、政治极化等“社会撕裂”的现状历历在目。这些惨痛教训启示我们,要立足系统性视角看待共同富裕,其不仅事关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更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厚根基,我国必须着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坚决防止两极分化。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习近平统筹把握两个大

局,深刻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征,深刻把握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作出了我国已经步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⑦这一重要历史定位判断。“共享”是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所秉持的核心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共享”原则,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保证全体人民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⑧,牢牢把握共同富裕这一前进方向。

第三,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在共同富裕领域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深邃理论解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和历史意义的同时,对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课题作出新概括:一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⑨这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论断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两个大局”所进行的深刻洞察和科学研判。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愿景、价值导向或者结果,其背后包含相对应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首先,共同富裕内含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形态的应有之义;其次,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同步展开,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人的现代化、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内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最后,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把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初心贯穿始终。

要而言之,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指导,在实践推进中不断发

展、日趋完善、走向成熟,实现了我们党对共同富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新高度。具体而言,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

二、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丰富发展了“发展与分配辩证关系”的理论

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辩证关系,也有一种变化着的历史联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是为了满足个人温饱,此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不可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⑩然而创造的物质财富却没有惠及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无产阶级支配自我的剩余劳动,衡量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是“个体需要”,如马克思所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⑫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只有真正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劳动者才会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关于“发展与分配辩证关系”的理论阐释为我国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处理发展生产力和分配发展成果两者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那里,未来社会还是一种理论设想和愿景,中国共产党人则把这种愿景变成现实。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多个“五年计划”,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提供了初步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强大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

穷”^⑬,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后富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⑭,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可见,邓小平也是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手段、作为过程来理解,最终的落脚点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十分重视两者关系,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不体现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不懈探索,这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物质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发展与分配辩证关系”理论进行了初步的中国化有益探索,然而受制于实际国情,造成了一定范围内收入差距扩大和一些财富不当聚集并存的困难局面。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规律,吸取经验教训,对“发展与分配辩证关系”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

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发展第一要务论”。“在前进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⑮并且,强调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⑯。在毫不动摇坚持发展的同时,习近平还始终强调要牢记发展的目的,“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⑰。

针对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如何处理“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手段—目的”论,如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这一问题,他强调“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⑱从习近平一系列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手段和目的,抑或是途径和目标,两者关系既不是偏重一方从而忽视另一方,也不是静态地齐头并进,而是动态地辩证统一。如习近平提出的“避免福利陷阱论”就阐明忽视经济发展而一味追求分配的严重

后果,“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①西方福利社会的历史经验表明,超出能力的“福利主义”模式不会长久,会带来诸如“福利骚乱”等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习近平还用“水船关系论”来说明二者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违背规律就会搁浅或翻船”^②。

习近平用“共同富裕蛋糕论”来类比,形象地阐述“发展与分配”二者辩证统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③。一方面,在“发展”这一“做蛋糕”过程中既重视“量”更重视“质”,既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更重视高质量的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分配“蛋糕”,只有“蛋糕”做大做好,才能让更多人共享更优质的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在“分配”这一“切蛋糕”过程中,可以通过普惠性社会福利政策提升劳动者素质技能,例如,注重妇女、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减少性别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区域不平等,使低技能低工资的劳动者提升劳动技能获得更高工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通过强化人力资本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就业的“量”、提升就业的“质”,从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概括而言,习近平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在深刻洞察国际局势变化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发展与分配辩证统一进行深入思考,创造性地提出“发展第一要务论”“目标与途径辩证关系论”“避免福利陷阱论”“水船关系论”“共同富裕蛋糕论”等一系列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关于“发展与分配辩证关系”的理论,阐明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牵引与途径设计之间的关系,为今后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道路上处理好发展与分配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引与行动指南,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

三、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丰富发展了“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生产资料公有制被视作共同富裕的保障。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不同

社会形态下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化的一般规律。首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④,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封建小生产所有制。其次,伴随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时,“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生产力部分)同“资本主义外壳”(生产关系部分)发生矛盾,随着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向公共生产资料转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归属和人民的富裕程度。马克思认为,分配结构完全由社会生产结构决定,“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⑤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资料归属问题决定了劳动产品的分配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获得剩余价值,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商品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而在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总产品在经过“六次扣除”^⑥后由劳动者共同占有,此时,才真正消除了剥削以及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的理论为后世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行“一化三改”,为共同富裕奠定所有制制度保障。毛泽东认为,当时实行的制度和计划可以带领人民逐年走向富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⑦改革开放后,为使我国各族人民尽快脱离贫困、实现富裕,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动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此外,邓小平也深刻认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保障地位,“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⑧。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愈发重视所有制制度对共同富裕的保障作用。他指出,既要“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仍要在共同富裕进程中“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⑧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理解更为透彻,一方面,汲取高度集中的单一所有制的教训,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带动就业、激发经济活力和动能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总结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极力缩小按多种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所导致的收入鸿沟,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保障作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这两方面辩证统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分偏重一方、忽视另一方不可取,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与此同时,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相关论述也充实了“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各种形态的资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就如何正确认识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这一问题,他强调:“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⑨这里资本的“消极作用”一部分就体现为按资本要素分配获得过高收入所带来的两极分化。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⑩。在加强对高收入规范和调节的同时,还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构筑“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举措,从而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转变。需要说明的是,“规范资本行为”并非排斥资本,而是要推动资本有序发展,驾驭资本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为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服务,这也体现出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辩证理解,即在发展中深化认识,在认识中更好驾驭,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新特点对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提出更高要求,习近平着眼于我国实际,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相关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所有制制度与共同富裕之间彼此支撑的作用机制,对不同发展阶段下所有制改革和共同富裕推进方向之间的联系,作出了更为深邃的思索和更加透彻的阐释,围绕新时代如何有效发挥基本经济制度对共同富裕的保障效能,创造性地提出“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新见解、新判断和新路径,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下推进和完善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进一步丰富、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关于“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的理论,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

四、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丰富发展了“共同富裕阶段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理论

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共同富裕是阶段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详细地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特征以及不同阶段下共同富裕程度。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劳动者用能够证明经过“六次扣除”后的个人劳动量的“社会凭证”获取耗费同等劳动量的个人消费资料。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劳动者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在社会劳动总产品进行各项扣除后,劳动者根据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劳动量获取相对应的消费资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此时,个人条件导致提供劳动量的差异以及“六次扣除”后再分配消费资料量的不同,会导致每个人占有消费资料的不均等,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并不会取消个人消费资料分配和占有的差别,只是保证了劳动者获取劳动产品权利上的平等。其次,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巨大的社会财富被生产出来,劳动从谋生手段转化为生活本身的需要,到那时,“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⑪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中劳动者按需分配,消费资料分配和占有上的差别仅仅因为个人的需求不同,此时所有人才会达到真正的共

同富裕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尽管未来社会不同阶段共同富裕程度存在差异,但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共同富裕是阶段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同富裕阶段”的阐述主要体现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阶段,并没有预想到,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东方社会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结合我国发展实情,将“共同富裕阶段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中国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又可再细分为两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④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深刻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急不得”,要结合实际发展阶段推进,“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⑤。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进一步本土化、中国化阐释。

新时代以来,立足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共同富裕阶段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理论。首先,将新时代这一阶段称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为今后共同富裕伟大实践指明方向。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⑥这意味着已经将现阶段和以往的阶段作出“区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这一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个阶段的共同富裕既和以往的阶段一脉相承,又在新的阶段上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其次,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分三个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十四五”末时,逐渐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35年时,全国各地区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1世纪中

叶时,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两者差距缩小至合理区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在探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每一阶段的重难点、目的和手段。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是对共同富裕阶段性特征的进一步细分,为我们在实践维度上做好量化、细化研究,因地制宜制定科学指标、考核方法擘画了蓝图。最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富裕动态发展论”。习近平认为共同富裕绝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⑦。在时间维度上,共同富裕虽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不是所有人同时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存在先后问题,不可能齐头并进;在空间维度上,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禀赋等差异,不同地区富裕程度仍会存在一定差异,所有区域不可能整齐划一地达到相同富裕水准;在实现富裕的程度上,不同群体的富裕程度存在层次差异,不可能达到平均主义。^⑧此外,“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进一步具体化了“先富带后富论”,是阶段性与必然性相统一在空间维度的伟大创造。

综上所述,习近平科学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深入洞悉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新特征和新趋向,作出新时代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一重大方位判断,提出了“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动态发展论”等一系列新论断和新举措,系统阐明了新时代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方位和路径选择,有力解答了新时代如何看待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一历史阶段的理论逻辑、如何分阶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等时代课题,进一步丰富、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关于“共同富裕阶段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理论,为准确认识我国共同富裕新阶段的发展特点与典型特征提供理论遵循,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实践牵引,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

五、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丰富发展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的理论

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马克思多次阐述过未来社会个人的精神富裕。《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资产阶级旧社会自我否定后的未来社会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会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⑥，而未来社会——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⑦——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会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还指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会不遗余力地提升社会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获取最大化剩余价值，而这种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⑧。可以看出，马克思用“自由发展”“自由个性”“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词汇来描述未来社会个人的“精神富裕”，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中每个人都将尽情施展其“自由个性”，即达到精神上的充分富裕，未来社会民众的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而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又为“自由个性”创造前提条件、建立现实基础，即精神富裕必须建立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都内在于未来社会，内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国虽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但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证明，落后国家同样可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也要求我们必须补“物质丰裕”和“精神富裕”这两门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改善。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民族力量得以凝聚，民族精神得以振奋。但同时也伴随着乱象丛生，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时而浮现，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存在斗争精神缺乏、政治站位不清晰等问题。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高度物质文明和

高度精神文明缺一不可，精神文明不仅包括科学文化，更应涵盖“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更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物质较为富足的当下显得极端重要。

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需求更加凸显。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仅在物质上存在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⑩。此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更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⑪针对前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深入洞悉我国近几十年社会思想观念变化趋势，顺应人民群众心声，作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⑫重大论断，第一次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概念范畴正式纳入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从“发展高度的精神文明”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术语转变，体现出习近平对“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理论上的提升有力助推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为今后扎实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行动指南。首先，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中国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价值前提，是凝魂聚气的首要任务。要大力解决党的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弱化问题，牢牢确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正本清源入手加强宣传工作。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人民群众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是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铸魂育人，高质量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促使理想信念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发展,推动“四史”学习。此外,还强调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习近平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和重大判断,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论的伟大创新,为新时代扎实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遵循。

总而言之,习近平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洞察人民群众思想观念转变的趋势,首次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明确纳入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愈发强调、凸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体现出对“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深邃理论思考。习近平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要义、实践要求的重要论述和重大判断,进一步丰富、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关于“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的理论,为新时代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深厚理论指引与根本实践遵循,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

六、结语

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在适应新时代以来推进共同富裕面临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对共同富裕规律认识上的深化。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学说的典范,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也有力解答了西方经济学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富裕如何兼顾?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新境界,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史的新篇章,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深入梳理和总结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具有广阔历史背景和厚重理论渊源,系统回答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方位、根本立场、指导原则和路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与本质要求,总结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有助于深化我们

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学习和理解,在根本上厘清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逻辑体系,领悟其深邃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深层次、多维度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特质与内在机理。

其次,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一种面向实践、指导实践的思想体系,聚焦阻碍共同富裕的深层次矛盾和风险挑战,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方案。总结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可以有效提升这一思想体系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实践效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实践要求,在第二个百年征程中以其武装头脑、推动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此外,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随着共同富裕实践的不断推进,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会不断丰富和完善,其原创性理论贡献也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最后,习近平共同富裕观饱含“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的人民立场和世界胸怀。治理贫困、步入富裕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习近平共同富裕观自始至终将中国自身的建设置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坐标系中,为全人类减贫脱贫,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提振了信心决心,拓宽了全新思路与实际道路。总结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反贫困理论的核心要义与实践指向,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体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④《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⑤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

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⑦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⑧《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2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3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⑬《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⑭《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⑮《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⑯《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⑰《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⑱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⑲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⑳习近平：《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求是》2022年第8期。

㉑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3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5页。

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了在未来社会个人分

配社会总产品前要进行“六次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1-362页。

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㉗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㉘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㉙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页。

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㉜《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㉝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㉞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㉟参见王腾：《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社会主义论坛》2021年第12期。

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3页。

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㊶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㊷《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㊸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